



## 黃春窕

黃春窕，身高一百五十四公分，開朗愛說笑，年紀輕輕就考上國際認證的品質技術師（CQT）證照，二十二歲離開東電化後，進入RCA一廠工作，同時在健行工專夜間部就學。擅於打通廠內的人際關係，除了二廠與夜班的同事之外，不認識她的人少之又少，薪水在當時也稱得上優渥，努力工作養活了一家子。

- 1954年 出生於桃園楊梅  
1976年（22）進入RCA一廠工作，於健行工專夜間部就學  
1978年（24）擔任PC板品管員，開始出現暈厥與流鼻血等症狀  
1992年（38）擔任RCA工會理事，並隨RCA關廠資遣  
1997年（43）首次到長庚醫院就醫，鼻咽切片檢查無癌細胞，疑似轉移  
1998年（44）鼻咽癌末期轉移到淋巴腺，開始放射性療程與化療  
2009年（55）為RCA訴訟案，首度以證人身分，在台北地方法院出庭作證

### 資料來源：

2002年，公視製作的紀錄片《奇蹟背後》發行，採訪逐字稿〈RCA職工系列專訪——嚴寒未摧傲霜枝，訪RCA自救會黃春窕女士〉，收錄於2004年《批判與再造》，杜繼平訪問，林育群整理。

2009年11月11日、2009年12月9日，以及2010年1月20日，黃春窕以證人身分出席台北地方法院民事第23號法庭的公開辯論筆錄。

2012年，由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召集義工完成的問卷調查紀錄。

2012年11月，黃春窕為了RCA口述史案，打字書寫的三頁A4文字（詳見本篇附錄）。

2013年5月，黃春窕替口述史初稿作出的修正、補充，以及再次打字書寫的一頁A4文字（詳見本篇附錄）。

一九七四年的台灣，開始實施十大建設，外貿總額高達十二億六千萬美金。那是台灣錢淹腳目時代的前朝，就在這一年，出生農家の黃春窕二十二歲，進入美商公司RCA工作，開始一場農家女帶領家族翻身之夢，一待就是十七年。

二〇〇一年，黃春窕四十七歲，已離開RCA十年，再次踏入永久污染的桃園RCA廠區，在這裡接受一場口述訪問。在這個年紀，理應是兒女已經獨立，開始與老公規畫退休生活。但她站在這塊永久污染土地也污染她身體的廠區，帶著已經進入第五個年頭的鼻咽癌。還能走、還能笑，還能對話自如也還能在早晨對鏡子說：「不錯，早上起來的時候，很高興今天不錯沒死又可以看到今天的太陽。」

二〇一〇年，黃春窕站在法庭上，面對著RCA請來的律師，震動她喑啞而衰弱的聲帶，難以辨識的氣音依舊堅定地一一點名：「我這組八個人，當中有五個人得癌症，有一個沒有得癌症，兩個沒有聯絡上……楊春英沒有得癌症，但是她有死胎。龔永香失聯。呂家欽得乳癌。楊玉玫得肺癌已死亡。許翠珠有免疫性、永久性重大傷病。韋雪琳失聯。陳若梅得子宮頸癌，她也有死胎。黃春窕鼻咽癌。」

### 那曾經的風光明媚

黃春窕，身高一百五十四公分，開朗愛說笑，年紀輕輕就考上國際認證的品質技術師（CQT）證照，二十二歲離開東電化後，進入RCA一廠工作，同時在健行工專夜間部就學。擅於打通廠內的人際關係，除了二廠與夜班的同事之外，不認識阿窕的少之又少，薪水在當時也稱得上優渥，努力工作養活了一家子。對當時的她來說，除了RCA，完全沒有想過轉換職業跑道。

黃春窕的家庭在四〇年代陷入一貧如洗。父親的船運在日本琉球被日本沒收，一無所有地回家，往後只能由商轉成佃農。父母鎮日為了生活去鎮上拉糞車澆田，結果澆太肥，別人家長稻子黃家卻長稻葉，繳完地租連三餐都成問題。運氣繼續落底，黃家人連生八個女兒，兒子一個也不見，其中第七個就是黃春窕。

困頓的經濟，碗中永遠是地瓜簽混飯，免得小孩盡挑飯吃，或者再不行就直接拿地瓜當主食。求學時，黃春窕往往到了學期末還繳不出學費，課本也買不起，她自己戲稱「二十六個英文字母少認了好幾個」，末了又不甘地表示：「若是有錢給我念書，我一定是個博士。」

由於家中經濟負擔不起，從高中就開始念夜校的黃春窕，十七歲左右便開始半工半讀，第一份工作在日商東電化（TDK）檢驗室工作。黃春窕手打算盤處理報表，珠算一級的她，

整天坐在檢驗室中做線圈尺寸握筆寫統計表，寫到二十二歲，寫出右手中指的握筆凹痕，但怎麼也想不到，這樣都好過日後那清潔劑的侵蝕。

離開東電化後，黃春窕轉到RCA工作，擔任一廠的品管員，學業表現則天才般地高分入學，由商科轉到電訊工程，一邊工作一邊在夜間部就學。二十二年的女工生涯，直到一九九二年RCA關廠才結束。

一進RCA，黃春窕面對的是一個禮拜工作五天、每日含加班時間平均九小時多的工作時數。早上、下午各十分鐘的休息時間，每個月高達一百餘小時的上班時間，黃春窕就待在一

廠三千坪大廠房中，坐落於總數十二條的生產線之一，呼吸著密閉空間中透過中央空調輸送循環的冷氣。

每日一早八點開工，先是半小時的查料後，黃春窕就整個人坐在品管之位，左臨松香槽，右擁鋸錫爐。負責品管的黃春窕，主要的工作是檢查主機板基板插件的完整正確性。RCA生產電視內部的主機板決定著勞工的身體勞動節奏：基板經過流動線，在女工插件完成後，浸洗在松香槽內，而後黃春窕目視有無插錯或漏件；接著基板再經過鋸錫，接著剪腳，沾著的清潔劑總是還來不及蒸發，線上作業員便得由雙手拿起基板仔細檢查，確認組裝無誤，再由身為品管的黃春窕抽檢。

近視的黃春窕，總必須雙手高捧主機板貼近臉部檢查，餘溫未散即吸入大量廢氣。每天工作，撲鼻的是三氯乙烯清潔劑的氣味，公司一個月發放一次的口罩，四、五天之後便不堪使用，接下來的日子就是毫無阻擋的刺鼻氣味伴入呼吸。雙手拿著清潔劑剛洗淋過的基板，一個月兩雙棉質手套，即使戴著也是被清潔劑滲透、與調和劑沾黏。一個手套堪用幾天，兩個都用完，接下來平均至少還要撐十五天左右徒手拿基板檢查。加上右邊生產線沒有遮蓋的松香揮發氣體，左手邊鋸錫爐的熱氣與封閉不全滲出爐內的煙，這是黃春窕最基本的工作環境。



阿窕與QC部門最要好的同事  
楊玉玲（左）於RCA廠區內  
合影。（黃春窕提供）

除此之外，每個小時一次的鉀錫爐測溫，才是「焊錫調和劑經高溫」的強力入侵。每回站在大大的密封玻璃鋁錫爐前，黃春窕打開爐門，兩百五十度的熱氣往臉上衝，P C板本身加上調和劑經過高熱揮發，凝聚在空氣中。每次得花五分鐘測量溫度，兩個鉀錫爐就是十分鐘之久，剛開始黃春窕還能知覺鼻子不舒服，時間一久也就麻痺，但伴隨而來的，是經常性的流鼻血和記憶中三次的暈厥，還有當時伴隨著羞恥感而不敢啟齒的兩次流產，約莫在她二十四歲與二十八歲的青春時光。

工作之外的休息時間，黃春窕就和其他人一樣，上廁所、喝水。廁所旁樣式簡單的飲水機提供了冷、熱水，每次休息十分鐘的時間，整廠大夥兒就搶著用，水來不及煮開，也只得照常喝。目睹過廠務部技工更換飲水機濾心，黃墨綠色的濾心看上去像褐色青苔，若再遲點更換就變成黑褐色，黃春窕再也不敢喝冷水，只好每天拿熱水泡茶，倒了一杯裝在雀巢咖啡罐裡，放著工作時渴了繼續喝。吃飯時間就是公司的餐廳，如果遇到周日加班公司不供伙食，便到外面吃自助餐，或更簡單一點直接把泡麵帶到公司，拿飲水機的熱水泡麵果腹充飢。

但當時的黃春窕怎麼也不覺得苦，由於認真努力、加班以及專業執照的加持，讓黃春窕當上了技術員，每月薪水總在千人之上。一萬多台幣的月薪，比起其他人一個月四千元的收入，對外實在足夠傲人，對務農的老家與替家裡貼補生活費來說也相當好用，畢竟當時正值

農業轉型工業發展的社會，老家種的米已經換不來什麼利潤，甚至連種田的成本都換不回。農村小孩踏入城鎮工廠，是當時整個農村社會出路的普遍選項。

不只作為家中的經濟支柱，黃春窕勞動所得更可大大改善家計，加上她舉一反三的聰慧、又常想點子協助公司改善作業流程，經常登上《RCA 家園》雜誌並獲得獎金，後期更當上工會幹部，在其他同事日後的回憶中，烙下熱情又活力充沛的印象。直到關廠前，黃春窕依然是廠內的活躍人物，擔任起 R C A 工會最後一屆理事之職，帶領其他勞工爭取公司的遭



年輕時的黃春窕。（黃春窕提供）

散費用。未料，除了遭散費，更嚴重的竟然是多年後才浮出檯面的廠房污染以及工作傷害問題。

### 奪命「少酒小人夢」

站在法庭裡，黃春窕身上揭露的是所有的RCA罹病員工，在這場踏入第十五年的官司戰場中，肉體都一步一步傾頽的事實。她像在講述一則古老的寓言：

當時的RCA，運送貨物的碼頭就在一廠與庫房邊，外面的麻雀就會誤闖到廠內，進到廠內的麻雀，由於缺乏乾淨的空氣，沒一會兒就無力再飛，總是隨手被庫房裡的高中生一把抓住。麻雀被帶到堆放有機溶劑空桶上，經過一會兒麻雀就被有機溶劑燻死了。

黃春窕細細講述麻雀之死，下了一個結論：「沒有任何一個人察覺到，只是覺得很好玩，現在事後回想起來，其實麻雀是告訴我們，你們的日子也差不多了。」

而誰又會記得，曾經連貓都來警告？黃春窕回憶起，她曾在姪子當兵前兩年，推薦他進廠

務部當水電雜工，短短兩年內，姪子不止一次發現野貓死在水塔裡。誰聽過貓死在自家水塔裡？姪子只叫黃春窕別吃公司伙食。日後，黃春窕才想起，曾經在《RCA家園》雜誌中，讀到一篇〈安全衛生篇〉，描述RCA主要使用三氯乙烯做為清潔劑，原料比空氣重上四倍到五倍，想來是貓聞到廠房排出的廢氣才昏死。那勞工鎮日呼吸的空氣呢？

她日後才恍然理解，難怪負責剪線房與電源線的工作都是單獨隔間、難怪那裡的勞工最多癌症，品管員兩位都得乳癌、難怪每回從外頭走過，裡頭飄出來的臭味都清晰可聞。但這理解實在來得太慢，一九九八年，黃春窕開始籠罩在無望的生命谷底。一場感冒引發了咳血痰，黃春窕趁著母親跌倒到長庚醫院住院時，順便掛了耳鼻喉科，結果，「為何感冒不會好？」的提問，換到的是醫生判定鼻咽出了問題：「要切片檢查。」

「什麼叫切片，根本不懂，我說好，就直接做切片。好痛，針好長好長，伸到裡面割兩塊肉出來。」心裡七上八下，黃春窕根本不敢面對化驗結果，最後是五姊與妹妹兩個人去，醫生說化驗結果沒事，但可能轉移而切片沒檢查到，奉勸她最好持續追蹤檢查。可惜黃春窕早已嚇破了膽，始終沒再踏入醫院檢查，任病情拖延，尋求民間治療祕方。十個月後，脖子腫瘤已經如鳥蛋大，扯著頸部肌肉，連轉頭也不能。最後妹夫將她安排至和信醫院檢驗，結果出來：鼻咽癌末期。

黃春窕不知如何回到了家，也不知如何處理後續問題，整個人傻著，到家燈也沒開，在黑暗中癱坐在角落。呆了、傻了，兩個孩子都還在學校上課，單親家庭裡，沒有另一個男人，她先打電話給妹妹，妹妹與妹夫兩人趕了過來。黃春窕忘了怎麼哭，妹妹倒是自己先哭了起來。對死亡的恐懼，可以讓一個人沒有任何武器或回應能力。「因為你沒有死過，你不清楚你摸不到的東西，你沒有辦法去感覺的東西……既然是癌，就是與死畫等號。」結果妹夫成為在場唯一清醒而理性的人，控制住妹妹的情緒，隨後妹妹說：「妳要自己站起來，妳兩個孩子我不會幫妳養，妳自己有本事生，妳自己要有本事養，我沒責任挑你那麼重的擔子，明天就幫你安排住院治療。」

能不能死，作為一個母親，黃春窕已經有了答案。

從此開始，黃春窕由一名高薪優渥的建設公司行銷講師，一個收入比雙薪家庭高又供女兒在英國唸書、替子女貸款置產的單親媽媽，轉變為一位與化療、放射線治療並存抵抗癌症的悍將。往後半年，放射線療程總共三十六次，每次十五分鐘，並合著化療每次療程七天，一次一個半小時。

這些療程不僅把黃春窕身體弄垮，又因為剛好是頭頸部，導致口腔潰爛，喝水如刀割，口水也吞不得，只能靠麻藥麻痺口腔，「先用麻藥麻了再吞水」。那如死刑般的撕裂疼痛，嗎

啡無效，貼片也無用，黃春窕整日背著一個嗎啡機器隨時打嗎啡，成癮的憂慮根本比不上忍不住的疼痛。因為化療導致血管硬化，針筒無法扎入血管，只好再做手術開個洞提供打針用。黃春窕喉嚨鈣化，喝水嗆到氣管，插鼻胃管餵食。忍無可忍，黃春窕親身使用醫生手中的實驗藥物，改善口腔潰爛結疤，實驗結束後，她請妹夫從日本帶一千顆藥回來，再拿五百顆給她的主治醫生，請醫生用在同處境的病患身上。原本口都不能張，好一點可以打開齒頰，一絲舒緩都是恩賜，黃春窕邁入一場只能靠樂觀正向與疾病抗衡的爭戰。

樂觀正面從來不是與生俱來的天賦，黃春窕身上的勇氣，是來自父親、姊妹、朋友及RCA同事夥伴們的力量與支撐。九十多歲的高齡父親，與黃春窕同住，「假如我倒下去，我爸爸就是倒下去，支撐著我勇敢活著。」生活的持續與情緒的維持，成為一種不得不然的責任感。妹妹與妹夫撐著她所有的經濟與龐大醫療支出，妹夫買血燕窩，去毛燉煮打汁過濾，讓妹妹天天送到醫院用鼻胃管餵食黃春窕，天天從桃園到醫院，壓力之大讓黃春窕的妹妹瘦了一大圈，妹夫心疼：「老七沒走，妳這樣下去都會先走。」除此之外，兩人總想辦法緩解黃春窕因絕望而想要自我了斷的欲望：「妳要有環保概念，跳河死，污染水質，影響人家飲水問題」、「要跳樓的話，要小心注意人家安全，就像有一個阿伯賣肉粽不想要死，妳上面一跳就把人家阿伯壓死」、「要跳要挑高樓層點，像我們家這樣三、四樓跳下來，會變

阿吉仔」同樣，姊姊每天燉雞精，總是買來未施打荷爾蒙的土雞，一隻雞燉上六小時，邊燉邊盛鍋裡滴流出來的汁液，去油凝成一小碗，透過黃春窕的鼻胃管灌食，補上她因化療和放射線治療直直落的體重。

家庭之外，RCA的同事楊春英，天天從中壢騎機車到楊梅，為已經硬化的血管做指壓按摩；楊玉玫每週六、日上醫院陪伴從不缺席；筱蘭與阿斗兩夫妻，天天載著黃春窕上醫院化療，阿斗開車、筱蘭負責攬扶暈眩的她，待打完針送她回家，阿斗才上工，開始每天的計程車生意。

親情與友情是支撐，同時釀成一種存活的責任。黃春窕總形容，如果牙痛是兩分的痛，生孩子是三分的痛，鼻咽癌是所有癌症中之最，「就是到第八分痛，是很難忍受的痛，十分痛大概是剪線房被錫爐燙死哀嚎的痛。」面對治療過程的疼痛，「妳一定要保持身心的愉快，」黃春窕對著鏡子能量飽滿地說：「我比人家幸運，妳看那得到慢性病的人，是一輩子的事情，我得到癌症，是百分之五十的機率有可能治好，有可能就死掉而已……既然我得到的是癌症，這不一定是絕症，我要與癌共存，我要怎麼去調適自己……」

這種幾近別無選擇的樂觀，對應的是一種無可原諒，面對肇事者的控訴。黃春窕不只一次陳述，廠內刊物《RCA家園》曾在論及公共安全與衛生時，將三氯乙烯、四氯乙烯、三氯

### 乙烷、甲烷等有機溶劑形容成「少酒

小人蔘」，「只要用法得當即對身體無害」。當時公司口中的「少酒小人蔘」，如今成為深植體內並隨著年歲四竄的毒物。十年前站在廠區的黃春窕，回顧著那些歲月，是這麼說的：

「真的錢疊到跟我一樣高，我都不會要。為什麼？我賺那一點錢，把我的一生都整個毀之一旦了，把我的家庭也毀之一旦了，全部都毀掉了。」

生命與健康，從來就不是金錢買得到的，這個道理，黃春窕拿了整個人生來懂。

其後，一九九二年，RCA關廠，黃春窕離開了十七年的工作環境。



2010年，在關懷協會大會上賣力發言號召會員的黃春窕。（工傷協會提供）

一九九八年，黃春窕確診罹患癌症，RCA受害員工正籌組自救會。一九九九年，黃春窕參與「RCA員工關懷協會」成立大會。

一場官司走了十多年，直到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九日早晨，黃春窕才終於有機會以證人的身分，站在法庭上，對著審判長說出：「因為我的無知，我有罪。因為我是RCA工會最後一屆的理事，我沒有發現公司污染的事件，造成那麼多人的得癌症及死亡。我的無知是因為RCA沒有告訴我們哪些溶劑有污染。」

然後黃春窕開始一一唱名那些離開了RCA、也跟著提前離開人世或被病痛折磨的工作夥伴。而我們都知道，往後，這份名單還會繼續增列與惡化。

## 後記

文／陳韋臻

我在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日的RCA關懷協會理監事會上，見到黃春窕，這位我即將把她

過去採訪資料撰寫成文的女主角。她個子嬌小坐著輪椅，大夥兒遠遠看見便有人起身上前為她開門，有人轉過身貼近我，對我描述她曾經的火力與精力。大家挪動椅子，讓位給她的輪椅，綠色口罩占據她整張臉龐，才有人告知我那以往的美貌，我無力前趨。她請荷雲吟誦她為了這次口述史案而打字書寫的三頁A4文字，病情不只讓她無法接受訪談，連自己打的文字都不能親自口說。在場人們拭淚，一場十多年的戰役，他們眼見著戰鬥力十足的戰友，被對手植入在體內的病痛折騰，除了疼惜、憤恨之外，還有更多的感同身受。

然後，這三張A4紙交到我手上，那麼重，被我收到輕輕的藍色透明檔案夾中，擱置了好久不能看也不能動。我記得，黃春窕說：「下班時工廠內的空氣有霧濛濛的感覺。有一點臭味。」她說：「給我們薪水很好……感覺滿好的。」還有，短短的那句：「到那邊好像要倖免不簡單。」

我打開空白檔案，開始學黃春窕，一個字、一個字，把故事慢慢打出來……這是在RCA戰役中，戰到肢體破敗還不放棄，用嘴巴喝一口水都是夢想，卻只為了眼見RCA為土地污染付出應付代價而繼續活著的，黃春窕。

## 附錄：阿窕的親筆信

阿窕身體狀況越來越惡化，說話也越來越吃力，更沒有體力到現場參與RCA運動的抗爭，但只要有力氣，阿窕還是會在電腦前，一字字將自己想說的話打出來，讓其他會員代為表達，用盡方法讓大家聽到她的聲音。

### 寫給環保署土地整治的委員們

**大** 鼻咽癌經放射與化療身體免疫系統變很差，拔隻大牙居然變口乾舌燥說話口齒不清。

很奇蹟第一次上法院要用紙筆來回答居然說的話八成法官聽得懂，不需全部用紙筆來回答法官與律師的問答。雙方共派十二位律師上場，在台灣大概少有如此大的律師團對案子投入，對方律師居然問祖宗八代的事，你爸你媽是什麼人？真是廢話，我爸閩南人、我媽是客家人、先生是外省人，真想回答比他還正統的台灣人。對方是想說我說客家人比較勤儉較

喜歡吃醃製食物，較容易得鼻咽癌。我家境不好從高中到專科都是半工半讀，假日又愛加班賺錢貼補家用，所以差不多都在公司吃較便宜，本身就不喜歡醃製食物。問我爸媽是如何死亡，母親跌倒送急診，醫生開完刀第三天出國由實習醫生處理，等到十天後醫生回來再開第二次刀變敗血，骨頭流失往生。若用身分證日期九十三歲往生。父親百歲人瑞，年歲已高不呼吸自然往生。

第二次出庭對我工作進行問話，提到我在《RCA家園》出現，回家去找以前主管把全套《RCA家園》雜誌找齊，現在正本大概只有國家圖書館與我有完整一套，其中〈工業安全與衛生說〉、〈談有機溶劑〉兩篇俗稱清潔劑說三氯乙烯、四濾乙烯、三氯己烷、甲烷等主要成分只要用法得當對身體是無害的別大驚小怪，那些清潔劑可用少酒小人蔘來形容，證據確鑿，可惜太慢看到也無法在此議題上與法官呈訴有力的證據。回想小姪兒上國中要做勞作，我常到木工房幫他做小書架等。當時木工房他們人數少沒飲水機，用水龍頭煮水來喝，有一年死了三名員工，害我嚇到都不敢去，原來他們是喝地下水枉死。木工房旁邊是廢料墳場油料堆放場，後側水槽區又挖洞倒廢料等，他們喝那地下水不死才怪。

關廠後六年回去看空蕩蕩的廠房，找遍一廠三廠連個蜘蛛網都沒有，更別說蟑螂螞蟻老鼠，想拍個照都找不到，可見污染有多嚴重，這多不人道害死多少員工還說少酒小人蔘真可惡。

上次拔牙變成骨髓炎，在台大開刀治療，開刀前醫生說風險性小，他已開五百多位病人，只是手術時間長約十一小時，需在小腿取一小節骨補上，再打入鋼架再植皮就可。沒預料住院三個月手術房進十次，最長一次手術十七個小時，好幾次都命危，家人好友都到醫院見我最後一面，老天認為我對RCA事件承諾沒完成，而妹夫也動用各種關係把我從死神挽救回來。更離譜的是，搭配我主治醫生的整形外科醫生，我入手術室還未曾看到他與我談手術狀況就動手術，割下腳骨入齒顎內卻失敗，再手術取出腳骨，打入的鋼架也失敗，再手術取出鋼架，為補手術傷口失敗又割，又失敗又割，一共全身上下割了九塊五公分正方型大小皮膚，割到沒地方，連乳房皮也割，真不知我是如何熬過來。可知癌症對免疫系統後遺症有多大，尤其又剛好是鼻咽部位放射區，RCA你對我造成的傷害浪費國家醫療多少錢，住院期間三個月請RCA同事金剛由屏東北上到醫院做我看護，他也是癌症病人，為了生活他也拖著病來照顧我，另外我最好的RCA同事春英每兩天由中壢坐車來幫我復健，出院回來由她幫我擦藥照顧我，家裡全部開銷全部由妹夫支付，他們說只要我好好把身體養好就是幫他們。

目前的我，原本會跑會跳，因開刀移植腳骨傷到神經變垂足不會走，原本會吃稀飯的我，現在需要胃開個洞，做胃造口灌流質食物，變成中度殘障，只要活著一天想用嘴喝一口水都是夢想，現在最低體重只有三十五公斤，一層皮包著骨頭，臉一邊缺骨頭整個臉歪斜真是人交代。

不像人，害我都不好意思出門怕嚇到人，現在說話人家都聽不懂我說什麼，只好用筆寫，這樣的活著真是生不如死，不知活著還有何留戀，一般人大概都會結束生命來收場。

為何我還硬撐著，主治醫生在我回診時看到我病容跟我對不起讓我受苦，我只回答希望在我的病例不要犯同樣的錯在別的病人身上，反觀台塑在美國污染事件賠了巨額還做到零污染處理，為何RCA事件到現在還沒處理？沒看到RCA官司完美結果，我不會輕易結束生命，要死我也要比美國台塑爬煙囪還大新聞才死，這樣才對得起社會與給下一代一個警惕與交代。

### 寫給對造律師

(這篇是用中英文呈法院給對方律師，他們若有人性與良心大概看得懂)

人的生存三大要素：陽光、空氣、水，而在RCA工作過的我們現在還剩下什麼？

我叫黃春窕，從二十歲起便進入RCA工作，之後在RCA擔任勞工工會理事直到工廠關

廠，由於知識不足而沒做好把關的工作，讓勞工喝重污染的水，吸重污染的空氣，讓勞工生命健康受到嚴重威脅，無數的家庭破碎，自己也身受其害。

我是鼻咽癌末期經放射治療與化療，治療部位剛好是吞嚥的喉嚨和頸部，整個過程真是痛不欲生，但沒打倒我，我比醫師所預期多活十五年，而當年在我身旁不斷幫我加油打氣的老同事卻一個個過世。我因鼻咽癌做放射化療免疫系統惡化，產生後遺症，二〇一二年只是拔一顆牙齒居然變成骨髓炎，而治療過程卻比一般人罹患骨髓炎困難許多，在台大醫院經牙科和整形手術十次，最長一次開刀十七小時，取小腿骨補齒頸骨失敗，神經受損變垂足不能正常行走，打鋼釘被身體排斥，手術又再度失敗，現在整張臉歪斜，身上能割的皮都割去做植皮手術，一次又一次的植皮，現在的我可稱的上是體無完膚，外加中度殘障無法吞嚥，連一口水都無法吞下，僅用胃造口來灌食，體重也降至四十公斤以下，言語溝通也有障礙，連和我的孩子都無法好好地講完完整的一段話語。

本來健康樂觀的我變成人不像人，僅僅三十五公斤的體重真像是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皮包骨體型。但上帝並不讓我放棄生命，要我對RCA污染事件做出圓滿的結局，上天給我無比力量，要我勇敢活著，向「卯上台塑的女人」、向黛安威爾森女士學習，當年台塑在德州污染事件時，她勇敢爬煙囪，最後達成台灣最有名的台塑賠償巨款案，並把污染整治成零污染。

染。還要向美國西岸單親母親艾琳女士用永不妥協的精神，對抗大企業污染事件，讓事件圓滿地以和解落幕。那麼現在，美國的企業RCA是否該對他們多年前污染台灣這片土地，造成許多員工死傷這件事情負責呢？

RCA污染事件突顯惡質的跨國企業，污染台灣土地，製造污染的水與汙染空氣，帶給RCA勞工巨大的傷害後，再用五鬼搬運法把資金撤走，請台灣最有名御用律師用拖延時間戰術，不對受害勞工的傷病和死亡做出任何賠償，長達二十年訴訟資方律師賺了大筆的律師費，工廠的土地污染只象徵性地整治廠區，而勞工的傷害卻沒合理賠償與道歉。我知道RCA弱勢的勞工用訴訟這條管道無法在台灣得到公理正義，我會帶著去長億公司找到的有利證據與廠務部高階主管提供給我的污染資料，效法耶穌的救世人精神，擣起被RCA、Thomson、GE重污染的十字架到美國喚起國際對RCA污染事件的關注，讓重視環保的美國人知道自己國家的知名企業是如此地對待其他國家，我們（RCA事件的受害者）要用生命換取不再讓全球黑心企業為了賺錢，去污染毒害弱勢勞工與土地，這樣上帝才會讓我生命畫下休止符。雖然我只有三十五公斤，步履蹣跚，言語困難，但我還是要為了台灣的RCA員工與家屬到美國奮戰到最後！

採訪資料

第一次訪談

時間：2012年7月14日

地點：桃園中壢辛鴻茂家中

訪員：林吉德、張榮隆、張偉瑜、江世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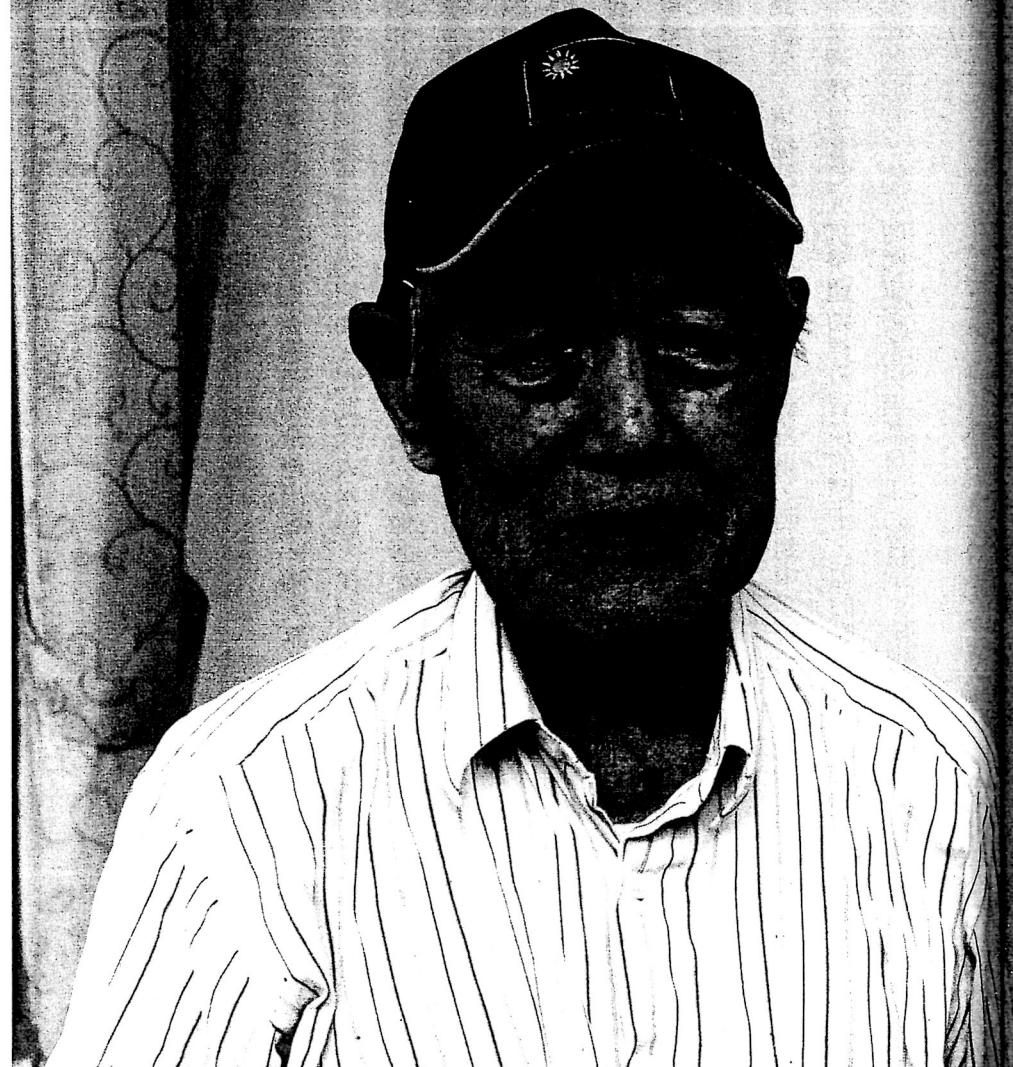
第二次訪談

時間：2012年10月25日

地點：桃園中壢辛鴻茂家中

訪員：張偉瑜

文字整理：張偉瑜、江世安



## 辛鴻茂

這幾年，辛鴻茂的腳漸漸有了些病痛，為了省錢，他常常從火車站走到法院，再從法院走回車站，轉幾段車，回到中壢龍岡的家為外孫做飯。頂著八十五歲高齡，辛鴻茂是 RCA 抗爭運動裡最資深的鬥士，他的晚年陪著關懷協會的工人們走過；他濃厚的口音、隨身的國旗繡章與樸實自律的言行，出現在一場場的街頭抗爭與組織運動，幾個協會的幹部也就處處照護著他，陪他走過這段火車站與法院間的路。

- 1928年 出生於中國大陸山東省
- 1948年（21） 國共戰爭隨國民黨來台
- 1968年（41） 與張秀月結婚
- 1976年（48） 秀月進入RCA小夜班，工作以電路板焊錫為主
- 1989年（62） 秀月確診為鼻咽癌二期
- 1990年（63） 秀月逝世，請領勞保退休金發現年資計算有出入，至RCA與主管發生爭執
- 1997年（70） 加入RCA員工自救會（RCA員工關懷協會前身）

一九九〇年四月十七日，張秀月因鼻咽癌過世，不過四十歲，對於結缡二十三年的丈夫辛鴻茂來說，是真的太年輕了一點。

辛鴻茂當時真想就這樣跟著她去了，可是不能，家裡還有三個女兒，秀月交代過他，要好好的把女兒們帶大。臨走前，秀月遺憾著從未坐過船和飛機出遊，兩人原以為辛勤的工作，終能換來安穩的晚年，想不到病魔來襲不過三年，從此天人永隔。從山東到桃園、從抗日到遷台，辛鴻茂走過征戰年代無處生根；他想要一個家，老天讓他遇上了秀月，可看著苦盡甘來的人生，怎麼竟埋藏著如此悲痛的轉折。

秀月過世四年後，RCA污染事件爆發。辛鴻茂聞訊便獨自找上RCA公司理論，並自寫訴狀打算為妻子討回公道，但沒有一個律師願意幫他。RCA罹癌員工組關懷協會的消息在電視上播出，辛鴻茂馬上連絡協會表達參與意願，從此只要接獲協會的大小活動通知，他總會出席，十餘年未曾退卻。

看不見盡頭的抗爭、沒完沒了的會議，這幾年，辛鴻茂的腳漸漸有了些病痛，為了省錢，他常常從火車站走到法院，再從法院走回車站，轉幾段車，回到中壢龍岡的家為外孫做飯。頂著八十五歲高齡，辛鴻茂是RCA抗爭運動裡最資深的鬥士，他的晚年歲月陪著關懷協會的女工們走過；他濃厚的口音、隨身的國旗繡章與樸實自律的言行，出現在一場場的街頭抗

爭與組織運動，幾個協會的幹部也就處處照護著他，陪著他走過這段火車站與法院間的路。

### 戰亂頻仍中的生離

一九二八年農曆八月初五，辛鴻茂出生於山東省萊陽縣名喚「李樹圈」的村落裡，家裡面除了父母、兄長外，還有爺爺、奶奶、叔嬸數人。善於經商的父執輩為家族累積了豐厚的田產，除了村子邊七、八十畝的土地外，東北大連、瀋陽、長春、吉林、哈爾濱等地都有辛家參與投資的產業。殷實的家業不僅讓年少時的辛鴻茂得以全心向學，直到共產黨以「大地主」之名展開一波波的清算行動。

當時，共產黨藉口辛鴻茂的三叔在任職保長，期間財務不清需要檢討，幸好辛家平日樂善好施，不求回報，且遠房老長輩兒子投身共產黨，幫忙說情，才得以逃過一劫。只是，緊接而來的第二次鬥爭，家中的長輩就難以倖免。辛鴻茂回憶：「那個時候共產黨要我媽媽來學校找我回去，我媽媽要我千萬不能回去，回去只有死路一條」，母親的叮嚀最後變為一語成讖的預言，無法逃離家園的爺爺、奶奶、媽媽最後都慘死於共產黨的鬥爭之下。

只是，逃離的人也注定了半生的顛簸。共產黨擊潰萬第鎮游擊隊後，「無校可歸」的辛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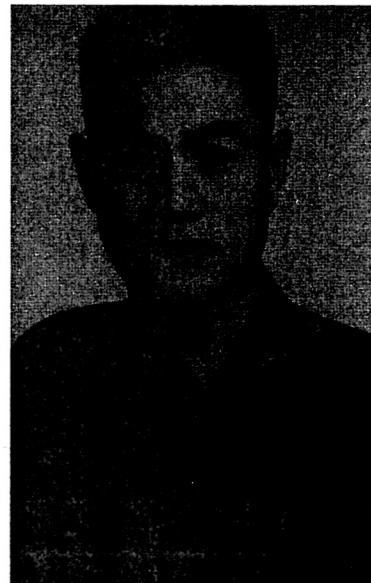
茂頓時成為隻身一人的流亡學生，後來在杜林頭遇到以前的老師，經安排在學校當了六個月的代課老師。與此同時，辛鴻茂的父兄叔叔們也逃離了老家，幾經輾轉後一家人終於在杜林頭短暫相聚。一周後，考量到辛鴻茂已有教書謀生的能力且眼下盤纏有限，因此父親只能領著一房各一個孩子遠走東北，而二叔、三叔則避走青島，又剩下辛鴻茂獨自一人在學校。再教了一陣子後，辛鴻茂也因為共產黨軍隊占領而離開。戰亂時期，許多老百姓為了有飯可吃而投身軍旅，辛鴻茂當時也是在這樣的理由下加入了游擊軍保安團的行列，首次即面對如潮水湧入進逼五十尺的共軍，不到十六歲的少年，在排長猛踢一腳後，被迫扣下人生第一次扳機；一次又一次，書生纖細白皙的雙手，自此染紅，那血色浸潤糾纏了辛鴻茂一輩子。

挨餓、受凍的情景實際上並未因軍人身分得以豁免。前有日軍無法進城，後有共產黨圍剿，坐困夾縫的部隊，只能靠著短缺的糧食、單薄的軍服與寒冬正面交鋒，又冷又餓的煎熬，讓辛鴻茂想自戕結束殘生，但父親的叮囑「再怎麼走投無路，也不能走絕路」阻止了他。之後，隨著軍隊的移防，辛鴻茂又陸續到了青島、即墨等地，隨著部隊整編入較大的師旅，溫飽已暫且不成問題，只是好學的因子更像止不住的飢餓，適逢當時萊陽中學又在青島復校，辛鴻茂當下決定拋除軍人身分重返校園。

由於返校的學生人數過多，原本該升讀中學三年級的辛鴻茂不得已只能編入一年級。再次

修習早已熟悉的課業，不免略顯乏味，爾後又遭遇校方利用學生領取救濟資源卻苛扣物資配給的事情，學生滋事抗議表達不滿卻反遭校方開除；種種不良的學習環境，讓辛鴻茂學習的期待落空，決定重返社會學習做生意的本事。

或許承繼了廚師父親的喜好，辛鴻茂落腳到青島一家頗具規模的醬園子，平日裡的工作就是買菜、洗菜、壓麵，偶爾陪老闆一夥人打牌，幫忙招呼、倒茶水，也是沒有薪餉的學徒的分內事。從少爺變夥計的身分轉變，問本該優渥一生的辛鴻茂是否因此感到難過，辛鴻茂只說：「當時心



年輕時代的辛鴻茂（辛鴻茂提供）

思裡想的都是要回家找共產黨報仇。」原來，透過同鄉口中轉知留守老家的爺爺、奶奶、媽媽已遭不測，這對當時僅有十八、九歲的少年來說，是勝過個人尊嚴千百倍的至痛。因此，即便後來獲得老闆的賞識，打算以嫁女兒留住人才承繼家業，但放不下的國難與家仇，讓辛鴻茂決定再次離去。

兵馬倥偬的年代，孤身無靠的人們能依附的多是軍隊或學校，而剛於青島復校的私立國華中學便成了辛鴻茂另一個短暫的停靠站。透過入學考試，辛鴻茂終於直升進高中部，但校方規定非煙台當地人必須自理生活，最後在沒飯吃、沒錢繳學費的考量下，辛鴻茂只能被迫放棄讀了兩年的高中課業，加入軍隊前往煙台。六個月後，東北失守，辛鴻茂憶起當年隨軍隊離開煙台時，老百姓苦苦哀求希望能上船的景象，至今依然令人心痛難受。

離開煙台又回到青島，不久之後，青島撤退的日子也來臨了，這是六月一日的端午時分，記不清在海上又度過了幾天幾夜，船隻終於停靠到基隆的碼頭，至此，四處周折的軍旅過程，終於在這南方蕞爾小島暫獲喘歇。

### 太平歲月的死別

見過辛鴻茂年輕時模樣的人，無不為他帥氣的外表迷倒。堂堂的相貌與知書達禮的氣質，的確吸引許多女子的青睞，但想到國家高喊的「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口號，留條命回家才是最急切的盼望。只是，再深的國仇家恨也隨著實現不了的「反攻大陸」被逐漸淡忘。身旁袍澤紛紛成家立業，年逾三十的辛鴻茂仍未識得有緣的另一半，直到同事介紹了張秀月。

張秀月，一九五一年生於臺南縣玉井鄉一個貧困的農家，十七歲那年，父親本打算以兩萬元將她賣出。不過賣往哪去呢？有大姊的經歷做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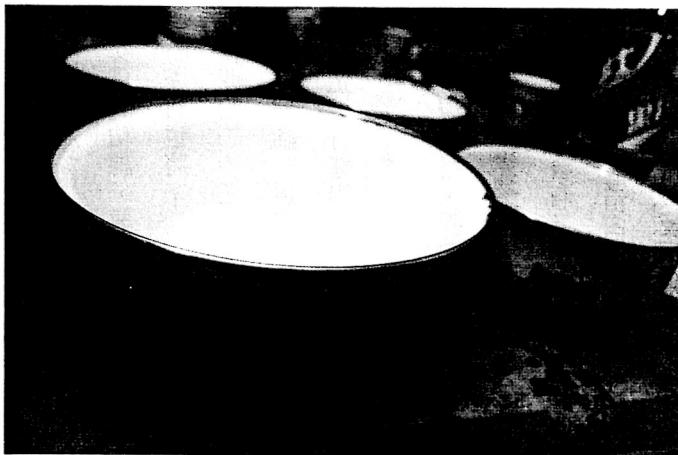
妻子張秀月（辛鴻茂提供）

前鑑，秀月心裡明白那將是從此不見光的生活，因此極力反抗甚至以死威脅：「你賣掉我，我出門就死。」只是再明確的表態也無力改變缺錢的現實，同樣嫁給外省兵的表姊想起先生還有個未娶親的同事，也就是辛鴻茂，於是居中做媒撮合。「因為年齡差太遠，我本來不要她，她雖然不識字但她很大聲地講了一句話說：『我沒有嫌你老，你還嫌我小啊！』」辛鴻茂回憶道。或許是秀月的篤定給了辛鴻茂勇氣，竭盡積蓄並向叔父借款，才湊齊可買二棟房子的兩萬元鉅款，順利將秀月迎娶回中壢。

對於秀月來說，嫁人或許只是不得已的替代，會有怎樣的婚姻生活，抑或被這個如陌生人老公給轉賣，都是不敢預想的未來。因此，當辛鴻茂隆重以待地張羅婚禮，甚至拍了當時還很少見的婚紗照，秀月在成婚當晚，淚如雨下，辛鴻茂問原由，秀月說：「我沒有想到是這樣。」心中那塊巨石卸下，化為日後幸福的基石。

婚後的生活，辛鴻茂不同其他軍人老公獨攬經濟大權，而是將每個月的薪俸悉數交由秀月打理，家中事也由兩人共同做主，甚至無意間得知兩人辛苦存的錢被倒會盡付流水，辛鴻茂不僅沒動怒，還不斷安慰驚恐的秀月，這全然的信任，讓她更辛勤持家，數年後拿出十七萬買房，辛鴻茂說這個房子、這個家，是秀月一手存出來的。

一九七八年，國家軍隊精簡，辛鴻茂被迫從軍隊退役，先到南崁的紡織廠工作，因為工作



在鐵工廠的工匠歲月留下的鍋碗瓢盆。（張榮隆攝）

太忙且薪資條件不夠優渥，後來才又轉到製作餐具的鐵工廠。數十年的工廠職涯，辛鴻茂一路從副領班當到組長，最後工廠因為成本考量移往菲律賓。當時老闆一直希望辛鴻茂可以過去幫忙，但考慮到秀月一人照顧三名幼兒的辛勞，更擔心在講究軍階輩分的社區裡，母女們可能吃虧又沒個依靠，因此還是決定以照顧家庭為重，而那段工匠歲月的記憶則轉換成各類餐盤鍋具，至今仍使用著。

至於秀月，也跟那個年代的眷村媽媽一樣，為了貼補家用，總是要在繁忙的家務之外再找些家庭手工的活。本來先是在家做鞋子的縫製加工，爾

後，透過徵人廣告於一九七六年進入RCA廠工作；為兼顧家庭，也只能利用辛鴻茂下班接手家務後，上五點到十一點的小夜班。秀月因不識字，一開始只能擔任小電視的包裝工作，後來再轉做沒人願意去的電路板焊錫，經年累月接觸化學物質卻不自知。

縱使每日家務工作兩頭燒，秀月兩隻眼始終緊盯女孩的功課，要她們讀好書找好工作，將人生的舵牢牢握在手上，走出有別於母親的路。同時秀月也將辛鴻茂照顧地妥妥當當，辛鴻茂出門往衣服口袋一摸，連零錢都放好了。「她跟我活的二十三年當中，沒有吵過嘴、沒有拌過嘴，有紅過臉，但是她看到我臉不太好，她就不講話，這很難耶！」對秀月聰慧與體貼的滿足，全寫在辛鴻茂臉上。夫妻倆就這麼胼手胝足地打造出一個緊密依靠的五口之家，也讓漂泊半生的辛鴻茂終於有了足以依靠的家，直到病魔降臨。

一九八七年，在RCA工作了八年的秀月身體開始出現不適，眼睛、耳朵、喉嚨等處陸續出現些小毛病，雖然總是過兩天就沒事，但就這麼反反覆覆地，即便檢查也始終找不出病因。期間，秀月仍持續在RCA廠房工作，也繼續飲用不知含有多少重金屬污染的地下水。一九八九年，身體依然微恙的秀月在台大醫師的診斷下，愕然發現自己罹患了鼻咽癌二期。

從此秀月進入漫長痛苦的治療期，醫療帶來強烈副作用，持續反胃無法進食，鉛六十掃過的秀髮無一倖免。這段期間辛鴻茂辭去工作，陪伴秀月就醫吃藥治療，看顧三個求學階段

的女兒，這個家由他一肩擔起。他在日記中這麼寫著：「到發現為不治之症後，兩人同時辭工，我負起全部家務事，侍湯餵藥陪往病院，此期間不是病痛而是兩人的心痛，每到夕陽西下時，兩人坐於院外鐵路旁，淚下如雨，刀絞雙心……」

治療半年後，找不到癌細胞，全家以為康復了，為此秀月很高興，提議拍張全家福做為慶祝；但這不是童話故事，沒有happy ending，當癌細胞捲土重來之際，殘虛的軀體已不是每日數千元一瓶的高價草藥可以修補的。從確癌到離世，老天爺並沒有給秀月多少時間。

憶起最後一次住院，辛鴻茂言詞中滿是憤恨與不捨。因為藥物影響胃口，已經長時間沒能正常進食的秀月更顯虛弱，情急下，辛鴻茂決定帶她回院打針補充營養。無奈醫院基於管理本位，認定沒有退伍證就不給入住，好說歹說，就算求一個急診室的臨時床位也不可得，當時交通不便，往返一趟要近四小時，妻子孱弱的病體怎堪這般折騰——醫院不是救人的地方嗎？一條命如紙薄？憤怒無助的他跟醫生吵了起來：「我拿到證件我會殺了你！」一位以知書達禮、學養豐富、自持自重的讀書人，被逼得撂下狠話。這只是諸多不公不義的開端，忿忿不平的辛鴻茂最後只能無奈地帶回秀月，隔天返回醫院、住院治療一周後，秀月於一九九〇年四月十七日告別了親愛的丈夫、女兒。辛鴻茂就此失重墜深淵……

我當時沒想到會活到現在，她剛死的時候，長達一年多每天都頭昏昏的，我當時在迴龍公車，頭昏了一下就栽下去了，有人扶我，他問我有沒有怎樣，我說沒怎樣，當時也吃不下飯，像無頭蒼蠅，到處跑。

我差點沒瘋掉，那時小孩一個上工專，一個國中，一個高中，要不是那時三個女孩都還在讀書，我真的想自殺……是她交代要我把這三個女孩帶大，所以不管有多少困難辛苦我都要撐過去。

### 深埋地底的正義

處理秀月的後事時，辛鴻茂發現秀月十一年的勞保年資，被縮減為三年；他拿著秀月因工作達五年表現優異獲頒的獎狀，要求公司講清楚，被質問的台籍幹部竟表示因秀月腿傷請假，依規定年資需重計。咦？RCA不是福利好薪資高，眾人擠破頭的高級外商公司嗎？怎會這樣對待死亡員工？因自己無權無勢才遭這種對待嗎？辛鴻茂很憤怒質問幹部，不可吃美國拿美國錢就當美國走狗欺負自己人。

直到一九九四年RCA桃園廠的污染案件被揭發前，辛鴻茂其實從未想過秀月的病跟她長期處於高污染環境有關。他記得秀月罹病時，醫生曾說過環境、遺傳及營養與生活習慣是罹患鼻咽癌的四個主因。辛鴻茂想，婚後生活雖稱不上富裕，但家裡的飲食也從未缺乏，且雙方親屬也未聽說有人罹患此類疾病；再回想起當時秀月的工作環境，除了缺乏管理外，手套等物品都是前一班用過的，有時候晚去了還沒有東西可用，維持空氣循環的抽風機經常損壞無法運作，特別是那被宣告遭受高度污染的地下水，正是秀月長年飲用的水源。

想通這之間的關係後，亟欲幫老婆討回公道的辛鴻茂，單身匹馬直闖RCA大門，等了好一會，高高在上的外商代表，表示自己不會講國語，辛鴻茂就用苦學多年的英文跟他應對，代表不斷地以英文陳述工廠的環境是如何合於標準與優良，並且認定員工罹病與工作環境毫不相干，說秀月的病是家族遺傳。最後辛鴻茂自己寫狀子找律師狀告RCA公司，狀中提及秀月工作情形、發病始末、醫師對病因的判定、病因與RCA污染的關聯等，條理分明、字簡意賅，卻因RCA早已撤廠而石沉大海。

一九九七年，RCA桃園廠員工開始籌組自救會，透過報紙獲知此訊息的辛鴻茂主動聯繫申請加入，並積極參與抗爭行動。對於有些年歲的他來說，往返桃園台北一趟要耗去不少體力，但他仍成為場場活動都出席的抗爭主力，從孤軍奮戰到並肩作戰，或許溫暖但不從眾。

問他所爭為何，老人家凜然而言：  
「我不要賠償、我不要錢，多少我不在乎，希望國家能有所表示，讓這些死去的人能得到正義，國家要把這件事公開，承認錯誤，別讓這些人死得不明不白。」

現在，辛鴻茂生活規律，每日定時

讀書、寫書法及運動，與出嫁的女兒一家同住，照顧稚齡孫兒；雖有伴，

卻也是分責任。子孫輩始終對這場戰役淡漠以對，辛鴻茂年歲已高，人生歷經無數生死交關的戰役，就這場戰打得最久，一打便是十五年。不諱言，辛鴻茂也曾感嘆關懷協會的會議與活動一場接一場，沒完沒了，這場



辛鴻茂參與2012年職業安全衛生法修法行動。（張榮隆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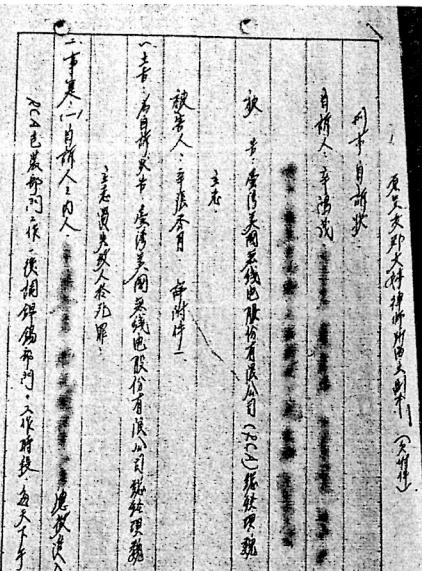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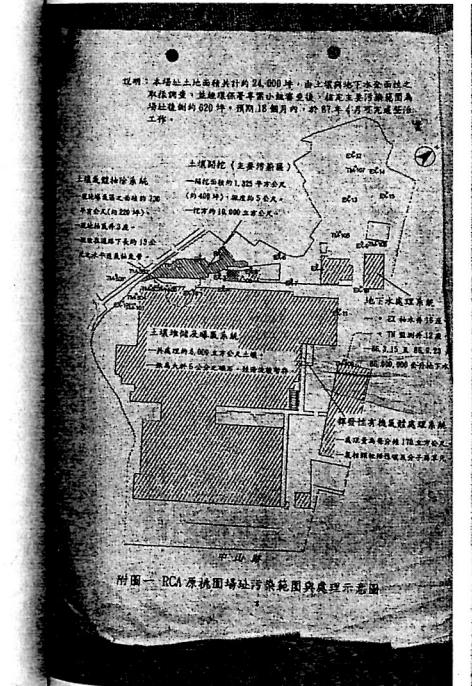
問他所爭為何，老人家凜然而言：

「我不要賠償、我不要錢，多少我不

在乎，希望國家能有所表示，讓這些死去的人能得到正義，國家要把這件

事公開，承認錯誤，別讓這些人死得

不明不白。」



附圖一 RCA原拋棄場址污染範圍與處理示意圖

辛鴻茂自己手寫訴狀找律師告RCA公司。（張榮隆攝）

馬拉松要跑到何時？那早逾齡未退的雙膝走得實在辛苦，但談公益談正義——又或者什麼都不談，就談秀月吧——秀月啊秀月，怎麼放得下？怎麼捨得放下？

走過八十多個年頭，泰半歲月都是一人獨自與命運奮戰著。面對這樣的人生處境，辛鴻茂總悠悠地說：「這應該是對我當年殺死太多共產黨的報應。」如此喟嘆，與其說是埋怨，更多其實是看重自我及他人生命價值的懺悔。如今，走過烽火戰亂的流離，棄筆從戎的無奈，獨自理家的茫然，面對諸種不公不義，辛鴻茂從不隨波逐流，不低頭不妥協，你看得見，他一心一意向高處騰躍直上的光芒。

「半個流亡學生、一個二等榮民」是辛鴻茂為自己一生經歷的註解，而讀書人及戰士的精神似乎也早已融入他的生活與體內，化成每日勤勉自學與對抗爭的行動支持，持續閃耀著。

註1——原為村長，國民黨接管後改採保長制，十家互相連保，連坐確保彼此不能犯罪、不得有共產黨身分。

## 後記

文／張偉瑜、江世安

書桌上躺滿書法練帖，另一端時下最夯的 iPad 在充電。國旗與勳章與獎狀布滿家中顯眼處，但斬釘截鐵要政府對 R C A 事件給交代。從文史哲、語言、政治、到數理工藝驚人的藏書，沒有養成文人的輕軟酸腐，面對不公不義，他一路挺身力抗。辛鴻茂，不落俗套，不受框架。

從絮絮叨來台前因戰爭的流離失所；到與秀月相扶持至陰陽兩隔，悲喜憂愁交雜巡梭臉上，從黑髮黑瞳到花甲之年，「家」是他的命脈，一路尋一路失，「沒有國哪有家」，國家開給老百姓的承諾呢？怎麼政府聳立如巨獸，羽翼下的家卻東倒西歪？這筆人生的總帳找誰算去，政府！你是該給個交代！



採訪資料：

第一次訪談

時間：2011年8月26日

地點：桃園縣八德市麥當勞

方員：黃德北、利梅菊、羅士翔、王鈞瑜

第二次訪談

時間：2012年8月29日

地點：桃園縣桃園市IKEA餐廳

方員：羅士翔、曹寶文、鄧筑媛

文字整理：羅士翔

## 秦祖慧

對秦祖慧而言，參與 RCA 抗爭已不是為了爭取自己的權利；經過十幾年來的抗爭，她認為單單要求 RCA 彌補職業傷害已經不再足夠，而是需要更進一步改造社會，呼籲政府及社會重視勞動者的生存與環境保護。祖慧認為自己不只是個職災受害者，更是社會運動的運動者，她上街頭抗議不能只是為了個人，而是要追求整體社會的公義。

1957年 在台南出生

1972年（15）進入RCA，於三廠擔任選台器維修員

1974年（17）因訂單縮減被RCA公司裁員，離開桃園回到台南  
身體已出現出血症狀，在台南任編織學徒

1979年（22）醫院告知不適合結婚、懷孕，與男友分手  
考慮就醫便利性，重回RCA

1991年（34）確診罹患紅斑性狼瘡

2007年（50）診斷為乳癌二期

2010年（53）為RCA訴訟案出庭作證

# 秦

祖慧自十七歲始受各種疾病侵襲，從心包膜積水、腎臟發炎、腎積水，和緊接而來的心絞痛、關節炎。一九八七年祖慧才三十歲，已經動過膝蓋、脊椎手術，然而醫生始終查不出身體病痛的原因，反而認定祖慧有輕度的精神疾病。病歷上寫著「精神官能症」。

對祖慧來說，病痛如此真實，醫生怎能因為診斷不出原因而武斷認定她有精神官能症，這五個字對她而言，是很諷刺的醫學名詞，令人無法接受。

一九九一年，祖慧三十四歲，時而生病時而住院的情況，讓她無法穩定從事一份工作。這回，祖慧因為發燒在醫院吊點滴，透過朋友的介紹，來到馬偕醫院風濕免疫科檢查，這次的檢查終於確認了她十幾年來身體各種病痛的原因——紅斑性狼瘡。這種慢性的自體免疫疾病，讓患者身體的不同器官都可能受到影響，這解釋了為什麼她身上有這麼多種類的病痛。

面對疾病，祖慧不曾懷疑RCA的工作環境可能造成發病。直到一九九四年，RCA工廠土壤與水源的污染被揭露，她才懷疑那喝了十年的水，可能是引起紅斑性狼瘡的元凶。醫師告知祖慧，紅斑性狼瘡跟工作、環境、飲食有關，進入RCA之前，她沒有任何病狀，家族中也沒有紅斑性狼瘡的病史。祖慧從沒想過，工作待遇相對人性化的RCA工廠，竟是造成她十幾年來身體大小病痛的主因。

二〇一〇年四月十四日，台北地方法院民事第二十三法庭，祖慧在這場歷時多年的RCA訴訟中以證人身分出庭，她告訴法官以及RCA的律師，她身上的紅斑性狼瘡是RCA的工作環境所誘發。又過了三年，訴訟進展仍然有限，對祖慧來說，除了希望能看到訴訟有令人可接受的結果之外，也希望能讓政府更加重視工作環境污染對勞工造成的傷害。她不能接受政府既已認定RCA廠址有土壤與水的污染，至今無法回復，撥出大筆整治經費，為什麼不願意正視RCA工廠所造成的人體傷害？

## 十六歲的RCA女工

小時候，祖慧的父親和朋友合夥組了公司，專門做折疊腳踏車零件，外銷到日本跟西德。祖慧念小學時，暑假還會到父親的公司打工，幫忙做零件。在祖慧國二的時候，傳來父親公司被掏空的噩耗，負債了三、四百萬，瀕臨破產邊緣，家中的經濟狀況突然有了破口。父親告訴祖慧與大姊祖萍，哥哥是家中長子，有養家的責任，要讓哥哥繼續求學。父親的意思是讓兩姊妹知道，讀完九年的義務教育後，兩人就要開始負擔家計了。

一九七一年初期，RCA剛來台設廠，祖慧的父親在報紙上看到RCA可以提供員工免費

的住宿，同時也提供建教合作的工讀方案——員工可在學校工讀，學雜費由公司補助一半，另一半從薪水按月扣。大祖慧一歲的姊姊祖萍因此比祖慧早一年離家到桃園RCA工廠，那時候RCA有專人和大型的遊覽車到各地就業輔導中心，坐滿一車就直接載往桃園。而祖萍離開家的那一幕，是祖慧永遠無法忘記的影像——姊姊拖著兩個大皮箱，費了很大的力氣，才把皮箱拖上北上的遊覽車。看著大姊進入RCA，她知道自己也將是跟大姊一樣的命運了；父親當時告訴祖慧，只有考上台南第一志願省立台南女中，才有機會再繼續念書，然而同時，父親仍讓沒考上第一志願的哥哥繼續升學。於是國中畢業後，祖慧就跟著大姊的脚步，來到了桃園的RCA工廠。

其實對於祖慧來說，離開家是件快樂的事情。父親性格嚴謹，對於兄弟姊妹的管教很嚴格，祖慧國中的時候為了紓解聯考壓力，跟著朋友騎著四十分鐘的腳踏車到農田去烤地瓜，擔心被爸爸發現而撒了謊，被拆穿後，父親大怒之下竟用皮帶抽打祖慧。五個兄弟姊妹裡，只有祖慧敢於挑戰父親在家裡面的權威，違逆父親的意思，這樣的反抗屢屢換來身上的皮肉痛。離家讓祖慧自認像是飛出籠外的小鳥，終於可以獲得自由，儘管必須分擔家中的經濟困境，但正值青春年華的祖慧也正期待著脫離家裡的束縛。

祖慧十六歲來到桃園RCA，開始在三廠工作，擔任電視選台器的維修員，修理整條選台



在RCA工讀時期的秦祖慧。（秦祖慧提供）

器生產線上的不良品，以及更換不良的零件。工作上她常需要用到烙鐵、焊錫，也會接觸到清潔用的有機溶劑。這段期間，RCA會隨著訂單量來聘雇員工，而所謂的「員工」是老闆可隨時終止合約的臨時工。當RCA需要增加生產線人力的時候，工廠會大量徵人；一旦訂單作完，為節省人事支出，工廠馬上就會開始裁員。十八歲不到的秦祖慧，也是以臨時工的身份成為RCA女工的一員，祖慧記得自己在這段期間就曾經兩度遭到裁員。

一九七四年，祖慧再次因為RCA訂單量減縮被裁員，她於是決定離開桃園回到家鄉台南。祖慧回到台南後，由於還是有家計的負擔，並沒有回到校園繼續學業。祖慧開始當編織的學徒，希望以後能靠此來掙錢，編織毛衣兩年後，她進入了另一間做活塞的正道公司，負責車床的工作。某日上班時，祖慧突然感到胸口疼痛，甚至休克昏倒，被送往當時的逢甲醫院（即台南奇美醫院）。檢查後，醫生診斷出有心包膜積水，但醫生並不清楚為何祖慧會有這樣的症狀；自此以後，祖慧就開始有一連串的、持續的身體上的病痛，包括腎臟積水、腎臟炎，當時她看遍臺南大大小小的醫院，都查不出身體是出了什麼問題。

一九七九年春節，秦祖慧二十三歲時，又因為老毛病再次來到醫院報到，她告訴醫生她過完年打算結婚，結果醫生告訴祖慧，以她的身體狀況，並不適合結婚。醫生表示她在婚後懷孕的過程當中，孩子還沒有正常足月生產，她自己就會因為妊娠中毒，而有喪命的風險。對

祖慧來說，醫師這樣的消息有如晴天霹靂，在她的觀念裡，女子結婚就是要孕育下一代，既然要結婚，沒有自己的孩子，沒有辦法孕育下一代，又何必要結婚呢？

醫師的診斷讓祖慧不得不改變她的人生規畫，一方面祖慧希望能夠再找更高明的醫生，找到身體疾病的主要原因；然而，祖慧也不想耽誤當時的男友，讓男友等待她，於是祖慧決定不告而別，來到了北部。

在台南的這段時間，一起從RCA回到台南的姊姊，因為身體非常不好，收入不如父親預期，父親對姊姊十分不滿，父親的敵意形成對姊姊的精神虐待，只要每個月到了姊姊薪水入帳的時刻，父親總是對姊姊百般刁難。祖慧無法忍受看自己姊姊這樣被對待，決心要和姊姊一同出走，於是，祖慧和姊姊再度來到了RCA的大門前。

## 重回RCA的生活

祖慧記得，再回到RCA是一九七九年的二月二十八日。當時要到四月五日才能領薪水，原先存下來的錢扣掉買生活用品，大概只剩下兩千元左右。祖慧記得，那段時間相當辛苦，兩人都得省吃儉用，買一份餐必須兩姊妹一起分著吃，有時候兩個人共吃十五顆水餃、一碗

酸辣湯，或者一碗泡麵兩個人分，這樣熬下來。

祖慧回到RCA，不只是為了多賺點錢，同時也是為了能夠接受更好的醫療。一九七八年林口長庚醫院成立，祖慧心想，如果來到桃園工作，便可以就近到這間新成立的醫院看病。同時，祖慧離家之後也有另外一個目標：對婚姻不抱有期待的祖慧離開男友之後，決定要重回校園多讀幾年書，她知道，以後還是得靠自己來養活自己。

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七年間，祖慧在RCA依序待過了三廠、二廠與一廠，回到RCA之後的前三、

四年，祖慧仍然從事十六歲初到RCA時的工作——待在三廠維修選台器。一九八一年、一九八三年間，她轉調到二廠的二十四站負責測試的工作。這段時間祖慧上小夜班，白天則回到高中就讀，拿著學校與公司的獎學金，在半工半讀的狀況下，終於完成了高中學業，並在一九八五年考上二專。

當時祖慧原有機會繼續以日間部學生的身份就讀二專，但RCA此時也提供她調職至一廠工程部的機會，對於祖慧來說，調到工程部是一個很難得的機運。尤其祖慧是從最基層的線上作業員開始做起，她很高興自己的工作能力受到公司的肯定。但是工程部都是日班，如果調工程部，祖慧將無法念日間部的學校。幾經考量之後，祖慧決定轉調一廠工程部，白天上日班，晚上念二專夜間部。一九八七年，三十歲的祖慧離開RCA到下一個公司時，已經拿到了二專的學歷。

回到RCA工作的這段期間，祖慧的大哥正在當兵，父母也漸漸老邁，於是祖慧與祖萍兩姊妹合力分擔家計，負擔弟妹的大專學費並償還家中債務。那段時間祖慧很賣命工作，平日白天上課，晚上上小夜班，寒暑假白天不上課時，她就到餐廳去打工，也曾經到果菜市場幫忙運送蔬菜。

由於RCA的小夜班是十二點下班，有時候會加班加到凌晨，祖慧趕完工作後，會在清晨



1987年，秦祖慧（左起第四）、秦祖萍（左起第三）參加RCA舉辦的五一勞動節南橫之旅。這是秦祖慧服務期間，最後一次參加員工旅行。（秦祖慧提供）

五、六點到縱貫路上桃園農工陸橋邊的果菜市場，拖南部運送上的蔬菜。祖慧對此有很深刻的印象，菜籃很重拖不動，老闆就給一個勾子來拖，拖一籃菜五十元，並不算多；可是她那時候很高興，因為可以現領現金，不用繳稅。

在RCA工作的這段期間，祖慧也來到長庚與榮總就醫，想瞭解身體的病痛，然而八年來祖慧持續的門診，身體的狀況仍然跟在臺南的情形一樣，甚至出現更加嚴重的症狀。從心包膜積水、心絞痛到腹膜炎、腎臟發炎、出血，也出現過關節炎；祖慧這八年住院超過三十次，並動過三次手術，兩次動在膝蓋、一次動在脊椎，做脊椎手術的過程當中，醫師也特別抽取了她的脊髓液作檢驗，但是都沒有發現有什麼異常。

最後，醫師直接在祖慧的病歷寫上「精神官能症」。祖慧很不平，她認為自己生病是事實，醫生查不出病因來也就算了，怎麼能夠說是精神官能症，精神官能症對祖慧而言是很諷刺的醫學名詞，當時她想說既然查不出，也就不要再看了，也停掉了服用十幾年的類固醇。

離開RCA之後，祖慧靠著在RCA工程部所學，到另外一家公司擔任研發工程師。新公司待遇比RCA好，然而紅斑性狼瘡（當時祖慧也還不清楚自己是紅斑性狼瘡的患者）引發的身體病痛仍持續傷害祖慧，因為病痛與就診的需要，她不能穩定上班，也讓她無法在同一工作地點久待，更發生過主管因為祖慧的疾病而將她解雇。之後，祖慧當過研發工程師，也

曾開過平價購物中心，到夜市擺攤，批發檳榔，也開過小吃店。

這段時間，祖慧繼續與身體的疾病博鬥，一九九一年的一次發燒感冒，在朋友的建議下，她來到馬偕醫院風濕免疫科檢查，醫師告訴她，要做一項很特殊的檢查，自己付費，還要自己送檢體到台北榮總。十天後，檢查結果出來，證實祖慧有「紅斑性狼瘡」。原來，紅斑性狼瘡就是過去十幾年，引發祖慧身體大大小小病痛的元兇。

紅斑性狼瘡是一種慢性自體免疫引起的風濕疾病，身體的器官因為免疫系統的失調而造成慢性發炎。醫學研究還不清楚引發紅斑性狼瘡的原因為何，一般認為可能是遺傳、環境因素、女性荷爾蒙或者是藥物等交叉影響而來。

祖慧不清楚自己為什麼會有紅斑性狼瘡，家族成員並沒有紅斑性狼瘡的病史，她只能依照醫生指示，乖乖就診。直到一九九四年無意間得知有關RCA污染關廠事件，祖慧才了解RCA工廠那塊土地已經被污染，水也被污染了；突然間祖慧心裡面一個悸動，想到自己前前後後喝了RCA那裡的地下水喝了十年，猜想紅斑性狼瘡是不是因為自己身體受到工業污染才引起的？當醫師明確告知她，遺傳因子之外，環境因子是醫界認為紅斑性狼瘡的致病機制之一，祖慧心中的疑惑漸漸解答。祖慧認為，這十年在RCA聞到的空氣、喝下的水，一點一滴累積，引起體內的紅斑性狼瘡，讓她成為家族中唯一一位患者。



2010年，秦祖慧出庭作證，述說一生與疾病為伍的歷程。她與姊姊祖萍幾乎出席了每場開庭。（張榮隆攝）



積極參與各場抗爭活動的祖慧。  
(工傷協會提供)

祖慧自一九七四年十七歲開始發生身體上的病痛，直到一九九一年才確知自己是紅斑性狼瘡的患者，醫學專家們無法回答究竟是什麼造成紅斑性狼瘡發作，十七年來祖慧也不知喪失多少次接受治療的機會？祖慧的前半生，從南到北找尋自己身體病痛的祕密，當RCA污染的訊息傳開，答案才逐漸明朗——RCA工作現場的污染是對於紅斑性狼瘡、這糾纏自己一生的疾病最有可能的原因。

### 從受害者到行動者

對祖慧而言，參與RCA抗爭已不是為了爭取自己的權利；經過十幾年來的抗爭，她認為單單要求RCA彌補職業傷害已經不再足夠，而是需要更進一步去改造社會，呼籲政府及社會重視勞動者的生存與環境保護。祖慧認為她不只是個職災受害者，更是社會運動的運動者，她上街頭抗議不能只是為了個人，而是要追求整體社會的公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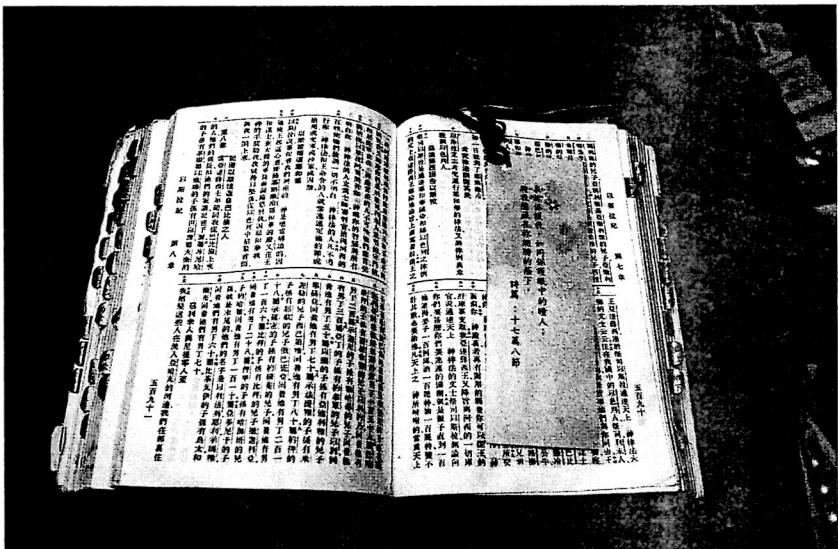
祖慧這樣的自我認知，也展現在她參與RCA員工關懷協會會務的行動：她在正式會議上，支持將訴訟所得之賠償，提撥更高比例為公益基金，並關心會員在訴訟中的既有分組，是否能符合他們現實中的身心受害情形。她也在乎協助RCA關懷協會的組織工作者的收入

能否無虞，而在大會上提案讓會員們關注討論。

對於大小病痛與癌症纏身的運動者而言，意識到並積極主張與自身權利無關或甚至可能減損自己利益，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祖慧認為追求公義的急迫性遠勝過自己的利益，這點我們也可從祖慧的一次求職經驗看出來。如今，在台灣的就業市場上，身體長期有病痛而且年齡也超過五十歲的祖慧，已經沒有太多機會獲得資方的青睞，只能靠教會、朋友的接濟過活。幾年前，祖慧有機會獲得桃園一所國中的工作，然而，當祖慧知道同去求職的另一名肢體障礙的大學夜間部學生，便放棄了這份本可透過關係順利取得的工作，讓這名學生可以順利獲選，只因為祖慧認為：「不能讓這個年輕人初入社會就受到不公平待遇，而對這個社會絕望。」

祖慧的抗爭性格使她在不同的結構與團體都處於邊緣的位置，而必須時時刻刻堅強奮鬥，或許正因為祖慧能體會邊緣的苦，而不想更多人身陷痛苦。近年來，祖慧透過教會培訓，開始到少年監獄、少年觀護所擔任教會布道的志工，協助弱勢的青少年走出迷途。除了RCA之外，協助更多的非行少年成為祖慧此刻最重要的生活目標。

十年的RCA工作換來四張重大傷病卡，從街頭到法庭，從資方到政府，對於身體的病痛，還沒有人能給祖慧一個可接受的回應，而對於社會公義，祖慧也還頑強地站在戰鬥的位置上。



祖慧、祖萍姊妹都是虔誠的基督徒。罹病後的日子，讀經、上教會是她重要的力量來源。（張榮隆攝）

## 後記

文／利梅菊

對RCA的最初印象，是媒體播報桃園RCA廠區土地污染，恐將永久不能使用的訊息，心裡只想到要排除購買桃園的農產品。後來因為家庭遭逢變故，根本無心關注社會事。再聽到RCA的訊息是多年後，透過工傷協會的活動，才重新瞭解RCA事件。

在抗爭場合認識祖慧，只知道她渾身病痛，此次陪訪對她多了一些認識，原來祖慧的抗爭性格是與生俱來的，難怪她拖著病痛也要站出來戰鬥，希望取得公義。

多年來工傷協會協助、陪同關懷協會至各部會（例如勞委會、立法院等等）訴求職業病認定，因協會人員散布全國，每個人條件不一，祖慧除了身體因素外，地理條件尚在北部，也勤於參加行動，但是對於協會非主流的訴求行動還是信心不足，其他甚少或不曾參加的會員更不用說。這跟協會協助的某些個別工傷者雷同，不管協助者如何解說他應有權益，還是要聽過律師說的才安心。其實不是不能理解他們的擔憂，只是感覺有些難過，工傷協會由工傷者組成，資源有限，成立二十年來服務、協助的案例無數，還推動職保法立法，促使政府制

訂過勞、職場精神疾病認定指標，但比起所謂的專家還是不易受到信賴。沒有專家頭銜的光環加持，要讓工傷者（當然含RCA會員）相信集體與組織的力量，我們還是要再加把勁。

文／羅士翔

祖慧厭惡不義、好打不平，在RCA案大小會議上，總可以看到祖慧積極參與的身影。三次訪談，將近八小時的訪談過程，我們總隨著祖慧的話語，飛到祖慧所看見的各種不公不義，以及她的抵抗，而不只是RCA案的抗爭經歷。

看著祖慧依著她的正義觀，積極主張可能跟自己利益相違背的事情，心中總對祖慧有些敬意，但有時不免想著，也許祖慧可以走一條更不會受傷害的路，但我知道那不會是祖慧要考慮的事情。很幸運地能有機會訪談祖慧，我看見的不只是一位RCA女工的受害經歷，更是一個堅毅女子默默用生命爭取公義的故事。

儘管，因為工作關係，我已很少有機會接觸RCA案的進展，但每隔一段時間，總會在不經意的時刻聽到朋友捎來RCA案的消息，RCA沒有離開我，也沒有離開這塊土地，仍在某種時刻提醒著我們這裡曾經發生，也仍在繼續發生的事情。